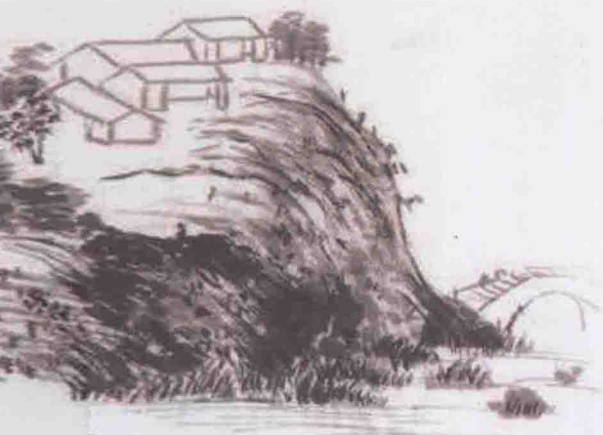


宋代笔记诗学 思想研究

邹志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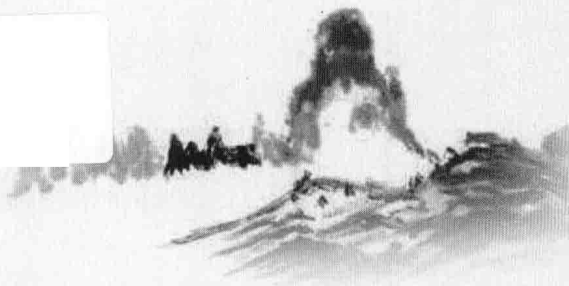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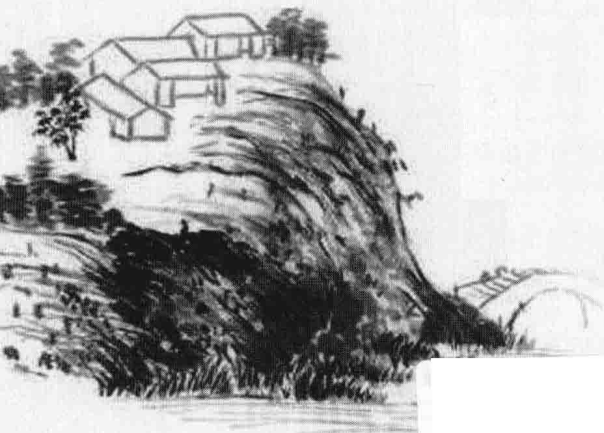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笔记诗学
思想研究

SONGDAIBIJISHIXUE
SIXIANGYANJIU

邹志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笔记诗学思想研究/邹志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1-4116-8

I. ①宋… II. ①邹… III. ①笔记—诗学观—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I22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9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刘京臣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a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笔记界义及宋人笔记概述	(2)
第二节 宋人笔记诗学思想综述	(15)
第三节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及现状	(34)
第二章 作为诗歌阐释方式的诗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44)
第一节 诗讖的思想渊源及形态流变	(45)
第二节 宋代诗讖的类型划分	(49)
第三节 诗讖的诗学阐释背景	(55)
第四节 诗讖阐释方式与诗歌创作的相互影响	(62)
第三章 仕隐观念与诗歌创作心态	(74)
第一节 宋人处世态度与隐逸思想背景	(76)
第二节 宋人仕隐观念形成的政治文化因素	(82)
第三节 宋人仕隐观念对诗歌创作心态及审美趣味的影响	(91)
第四章 诗歌解读与南宋诗教观念	(110)
第一节 涪溪题咏以及问题的提出	(110)
第二节 从对《大唐中兴颂》的议论看宋人的诗歌解读习惯	(112)
第三节 元结《大唐中兴颂》创作意图考论	(122)

第四节	“为尊者讳”、“美刺”说与南宋诗教观念	(127)
第五章	涵养正气与气象审美范畴的确立	(142)
第一节	从“气”到“气象”的演变	(142)
第二节	宋人笔记对气象内涵确立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145)
第三节	气象审美范畴的确立	(161)
第六章	循理证实风气及宋诗理趣美的生发	(169)
第一节	关于诗歌是否合乎常理的讨论	(169)
第二节	循理证实风气与宋诗理趣美的生发	(179)
结语	(189)
参考文献	(197)
后记	(212)

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文学研究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宋诗及宋代诗学理论研究，更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其中，宋代诗学研究，诚如张毅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所说，“包括宋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涉及对宋诗风格和艺术特征的把握，宋诗体派的划分，对宋诗发展过程和历史地位的考察，宋诗的整理，以及宋代诗话和诗论的总结分析等诸多内容”^①。诗学至宋而极盛，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宋以后人多有持批评意见者，如称“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②，“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③等，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宋代诗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宋代数量庞大的诗论材料，如单篇论文、序跋、论诗诗、诗话、笔记、诗文选本、评点等，也为后人研究宋代诗学提供了较为翔实、可靠的文献依据。宋代诗学的研究，无论是创作经验总结还是理论批评，都离不开诗学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但是，历来研究宋代诗学者，大多注重专门论诗的文献材料，而对笔记文献的诗学价值重视不够。一方面，人们对笔记的认识存在误区。长期以来，学术界或将笔记视作古代小说的一部分，或将笔记仅仅视作考证历史的文献材料，而对其诗学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

① 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上册，第四章《宋诗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② （元）赵文：《郭氏诗话序》引“或言”，《青山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也是由于笔记中的诗学材料零散、琐碎，难以对它作整体研究。实际上，数量众多的宋人笔记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诗学材料。由于著者在笔记中对诗歌进行解读、议论时，一般采用摘句的方式，进行感悟式的评点，他们的诗学观点得以在轻松的笔调中自然流出，因此，宋人笔记中的诗学文献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状况。其内容广博，涉及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诗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形式多样，富有较强的理论张力。对这些诗学文献进行搜集、分类、归纳和研究，对于今人了解与诗歌创作主体相关的诗歌本事、诗坛掌故及奇闻逸事，考察宋代诗人的生平、交游，为其作品辑佚、系年，研究宋代诗歌的创作背景、审美风尚，以及把握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而建构宋代诗学思想体系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笔记界义及宋人笔记概述

历来研究宋代诗学者，大多注重专门论诗的文献材料，而对笔记文献的诗学价值重视不够。这与笔记中诗学材料的零散、琐碎有关，也与人们对笔记的认识误区相关。特别是近代以来将笔记与小说联系起来，统称为笔记小说，更使人们误将笔记视作小说。实际上，就其创作态度而言，大多数宋人是比较严肃的，即便是自称“资闲谈”、“广谈助”者，其目的也仍然在于记录平生耳闻目接的逸闻轶事，以为杂史之纂。可见，宋人创作笔记著作，随手而不随意。从内容上看，其包含的诗学材料丰富而有价值。在宋代，笔记中记载的诗歌材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阮阅《诗总》自序说：“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岁，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①

^① 阮阅编：《诗话总龟》后集附录，周本淳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也称：“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①在宋人眼里，笔记、小说、诗话同属于杂记、野录之类的著作，由此也可见宋人对笔记中诗学文献的重视程度。近年来，研究界开始重视对笔记中诗学价值的研究，最有影响者，当属张高评先生所著《宋诗特色研究》。但总体说来，对宋人笔记所反映的诗学观念，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选择笔记中的诗学材料为研究对象，从笔记重视诗歌本事、彰显诗人风貌、展示时代精神、引导审美变化等方面入手，运用归纳、比较、解读等方法，试图对宋代诗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认识和把握。

一 “笔记”概念的界定以及与小说、诗话的关系

所谓笔记，应当是一种将人物逸事、日常见闻、典章制度、风物习俗、读书心得、学术潮流等内容，以杂记、闲谈、考据、辨析等方式，予以随笔记录的文体。^②因其书写形式的随意性，其内容包罗万象，纷繁杂乱，各类内容之间一般没有逻辑联系，显得零散琐屑。又由于笔记内容多为对日常耳闻目接的忠实记录，故其撰著意图大都以纪实为本。其异名多种多样，如随笔、笔谈、笔录、杂识、札记、丛说、漫录、谈丛、纪闻等。

笔记之称，始于六朝。《南齐书·丘巨源传》曰：“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③《文心雕龙·才略》曰：“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④前者是随笔记述的意思，并非文

^①（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廖德明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②笔者这里对笔记所作的定位，是指狭义的笔记而言。而广义的笔记，应当包括所有以随笔记录的方式形成的著作，如《论语》等语录体著作，古代文言小说，专门类型的诗话、词话、文话，以及艺术门类中的书画、篆刻、工艺等相关著作。

^③（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4页。

^④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页。

体；后者虽为文体，但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二者均不是本书所说的笔记。而最早以笔记命名的著作，应该是北宋人宋祁的《笔记》，其内容分释俗、考订、杂记三类，后人又称为《宋景文（公）笔记》。但是，这并非最早的笔记著作，这一类型的著作至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和应劭的《风俗通义》等，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分门别类地对古代的礼乐、政教制度进行考证辨误。但由于古人观念中，对此类著作并无清晰的认识，传统目录学中也并没有明确的归类，因此我们很难确考笔记著作最早出现于什么时期。

笔记与小说天然有着夹杂不清的关系。从现存文献看，笔记与小说可谓同源而异流。小说一词，出现较早。《庄子·外物》曰：“饰小说以干县令。”^① 这并非指后世意义上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② 实际上，这里小说的含义，实等同于笔记。《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③ 稗官，如淳注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语，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以称说之。”由此可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意，“王者”欲知风俗，考察民情，可由此入手，乃立稗官一职，进行广泛收集。因此，桓谭《新论》乃谓：“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④ 此时，小说与笔记相类似，其性质介于子史之间，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其撰著者均怀有纪实

①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卷九上，王孝鱼整理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925 页。

② 《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448 页。

④ 参见（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拟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雁”李善注引，中华书局 1981 年影印本，第 444 页。

所谓“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采访近世之事”也。^①大概是认识到它近于史而又不同于史的缘故，史臣在《隋书·经籍志》中，除沿袭汉志“小说家”类的分类外，又另立“杂史”、“杂传”两类，将笔记著作分别归入这三类中，并阐明了之所以如此分类的理由：

自秦拔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悯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②

正因其属“率尔而作”，与正史的严谨态度不同，故史臣以非“史策之正”而别入“杂史”。这类著作，或由“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或后之学者“钞撮旧史，自成一说”，或闻于“委巷之说”，均是有识之士身处乱世，出于存史的目的而作。同卷“杂传类”的情况与此相似，也是“史官失其常守”的结果。其略异之处在于，“杂史类”偏重于载事，“杂传类”偏重于记人，但“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而“小说家类”则仍沿袭班固的观念，择以存之。由于新旧《唐书》不取以小序“发明其指”的做法，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其归类的具体情况加以辨别；另据《新唐书》卷五七

①（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②（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2页。

《艺文志》序所谓“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也可看出，《唐书》对笔记、小说的看法仍大致沿袭隋志之例。《宋史·艺文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它将“杂史类”分为“别史”、“史钞”两类，“杂传类”分为“故事”、“传记”两类。^①而据宋志序所称“幽怪恍惚，琐碎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亦可证史家的态度。

从正史的态度看，史家并未因笔记、小说之语出于道听途说，内容多悠谬怪诞而略存轻视之意。即从著作者及读者的角度来说，亦未尝以“小道”视之。如前举干宝《搜神记》序。又王辟之在《澠水燕谈录》序中称：“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作者同年进士满中行题语曰：“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以屑屑记录以谈助而已哉！……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谑，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②由此可见，宋人著笔记，仍有杂记正史之余的目的。

由上可见，所谓笔记与小说同源，是就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言的。而二者表现出来的异流，则是唐代“传奇体”小说产生后，随着现代意义上“小说”成分的逐渐增多，小说与笔记在唐代出现了分流的迹象。^③此时的小说大致分为传奇体小说和笔记体小说两类，其创作突破了“写实”的限制，更注重人物形象的丰满，情节的曲折，语言的优美，以及故事结构的完整，作品内容的社会性也渐渐加强。即鲁迅先生所谓“始有意为小说”^④，也就是董乃斌先生

^① 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杂传”已分为“故事”、“杂传记”两类，但从其“杂传记”的名目看，史家的区分意识似乎不是很明显，因此，笔者将此区分归于宋志。

^② （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吕友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③ 按：这种分流是指其创作形态而言，在观念上，仍混二为一。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序曰：“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西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由此可见一斑。参见《青箱杂记》，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章《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九卷，第70页。

所认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① 而此时的笔记创作，也逐渐剥离了荒诞、悠谬的成分，而加重了纪实、考证、议论的色彩，确立了它相对独立的随笔式散文文体的地位。

以上简要说明了笔记与小说的复杂关系。到了宋代，随着诗话体论诗著作的定型和繁盛，笔记与诗话之间又滋生出较为复杂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诗话之体是从古代记事类笔记中衍生出来的。话，原义为言语、话语，到唐代时，代指“说唱故事”。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② 观《六一诗话》的内容，多述及有关诗歌本事及诗人逸事者，欧阳修将自己的论诗之作命名为“诗话”，意思或本于此。司马光《续诗话》小序言及续欧阳修《诗话》的理由时，曾说：“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也说明诗话在宋代最初定型时，虽多就诗人、诗作入手，但仍以“记事”为主，或可称为“谈论诗的笔记”。因此，此时的诗话与笔记，界限并不是很清晰。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所谓“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等论，^③ 是未能看到诗话脱胎于笔记这一客观事实；若将章氏之论中的“诗话”换成“笔记”，则正符合笔记的真实面貌。故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说：“诗话出于《本事诗》，《本事诗》出于笔记小说。”^④ 实际上，诗话与笔记相比，也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在形式上，它们都是以短章的方式随笔记录，具有形式短小、叙述自由灵活等特点；在创作态度上，均表现为比较随意，不太严谨；创作目的大多为“以资闲谈”，“以为谈助”；在

①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② 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③ 《文史通义校注》内篇卷五，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

④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内容方面，它们涉及面均非常广泛、庞杂，各条之间都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而在它们共同具有的评论诗歌方面，又都涉及“论事及辞”和“论辞及事”的两种体制。^①但是随着诗话渐渐从笔记中独立出来，二者在内容、形制上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诗话无论“论事及辞”还是“论辞及事”，通常要以说诗为中心；笔记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到了宋代诗话创作后期，特别是随着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的问世，诗话在论诗方面，更注重对诗歌文本的直觉感悟与理论把握；而笔记在涉及论诗内容时，大多反映了时人的关注热点和诗学风气。也由于这样的差别，《四库全书总目》便将诗话列入集部“诗文评类”，而将笔记归于子部“杂家”等类，从目录学上部分地厘清了二者的界限。但实际上，在集部诗文评类中，仍然杂有部分笔记著作。如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全书共四卷一百一十八条，虽多论诗之语，但仍有六十余条涉及读书札记、世风、政事、科举等方面内容。“学海类编·集余三”著录有《吴氏诗话》二卷，系由《荆溪林下偶谈》中辑录论诗之语而成。后人这样做，说明他们并未将该著视为诗话。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如署名洪迈撰《容斋诗话》、释文莹撰《玉壶诗话》、赵令畤《侯鯖诗话》等，也均是后人辑录原笔记中论诗之语而成。这类做法虽然为今天的诗学研究带来了方便，但在目录学上却造成了混乱，我们在区分宋人笔记与诗话的关系时，尤其应当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对于笔记、小说、诗话等著作的划分，并无非常明确的标准，即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所谓“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②。笔者作上述分析，乃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并无将今人的标准强加给古人的意思。

^①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按：笔者认为，诗话和笔记的体制还应增加“论辞及人”的情况，这在诗话著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当然，郭先生或许有人、事不可能须臾分离的考虑，故笔者在行文过程中，仍沿袭郭先生的说法。下文亦同。

^② 《文史通义校注》内篇卷五，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二 宋人笔记的认定、数量、分类及本书立论的选材范围

本书所谓“宋人笔记”，原则上是指宋代（960—1279）文人所作的笔记著作。对于著作的限代，通常以成书时间和作者身份的归属为标准。由于大多数的笔记难于断定其确切的成书时间，而笔记通常是作者晚年记录平生见闻和读书心得而成，因此，作者的主要生活事迹、成长经历和情感归属，便成为笔者判断的标准。这主要有两个阶段需要注意：第一，宋朝建国之初，有一些由五代十国入宋的文人之作。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相对动荡，政权也不统一，所以此时的文人较少情感归属问题，其著作的限代除成书时间确定者外，便主要以其生活、成长经历为准。如钱易（968—1026）的《南部新书》，据钱易子钱明逸序可知，该书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则钱易本人虽由吴越入宋，但我们仍然认定该书为宋代笔记。其他如郑文宝（953—1013）的《南唐近事》，张洎（933—996）的《贾氏谭录》等，与钱易的情况相同。又如，徐铉（916—991）初仕吴，后转仕南唐，由南唐入宋，曾任给事中、右散骑常侍、左常侍等职。虽然他在南唐时，便在小学方面与其弟徐锴并称“二徐”，在属文上与韩熙载齐名，但入宋后，也曾先后参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并以此闻名于世。故其《稽神录》编撰时间虽历经南唐保大十三年至太祖开宝八年（955—975）二十年，^① 仍可认定其为宋人笔记。其他类似者还有陶穀（903—970）的《清异录》等。第二，宋亡后，有一大批由宋入元的文人，根据他们的情感归属，对那些以宋遗民自居且体现出足够民族气节的文人的笔记著作，认定为宋人笔记，当无疑义。如周密（1232—1298）的《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等，陈世崇（1245—1308）的《随隐漫录》，俞琰（生卒年不详）的《席上腐

^①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引《稽神录》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谈》、《书斋夜话》等；但笔者的取材范围，仅选择其中涉及宋代人物、事件、诗歌等方面的内容。

从以上认定的宋人笔记看，宋人笔记著作的时间范围当不限于宋代立朝的 320 年。在这 300 多年的时间里，宋人共创作了多少部笔记著作呢？张高评先生根据刘琳、沈治宏编著的《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对宋人笔记进行了不完全统计，认为内容涉及文学史料价值者，大约在三百种以上。^① 但是就其所举类别看，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宋人笔记的真实数量。因为仅举张先生未予考虑的史部杂史类、琐记之属来看，其中就有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玉壶清话》，王辟之《澠水燕谈录》，魏泰《东轩笔录》，朱弁《曲洧旧闻》，王明清《挥麈录》等数量很多的笔记著作，它们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也为今人所普遍承认。何况还有史部、子部等其他门类。因此，仅从这一点看，张先生所作的统计便非常粗略。笔者同样根据《现存宋人著述总录》，以笔者所认定的笔记内涵为标准，对宋人笔记进行了梳理和统计，认为宋人笔记数量当至少在五百种以上。结果如下：史部：杂史类、事实之属，有郑文宝《南唐近事》、张唐英《蜀梼杌》、旧题史虚白撰《钓矶立谈》等 27 种；琐记之属有王说《唐语林》、欧阳修《归田录》、魏泰《东轩笔录》等共 58 种；史评类、议论之属，有葛洪《涉史随笔》、钱时《两汉笔记》等 15 种；考订之属，有李心传《旧闻证误》等 1 种；传记类、通录之属，有陆游《家世旧闻》等 3 种；专录之属，有李宗谔《先公谈录》、王素《文正王公遗事》等 21 种；杂录之属，有周必大《闲居录》、《泛舟游山录》2 种；政书类、掌故琐记之属，有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庞元英《文昌杂录》、叶梦得《石林燕语》等 10 种；时令类，有吕原明

^① 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专题一“会通化成与宋诗特色”，长春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1 页。他统计的依据是：子部杂学类，杂论之属 115 种，杂考之属 31 种；小说类，杂录之属 167 种，“是后人所谓宋代代记者”，合计为 313 种。参见《宋诗特色研究》，第 80 页。

《岁时杂记》、张鉴《赏心乐事》等4种；地理类、杂志之属，有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龚明之《中吴纪闻》等22种；游记之属，有陆游《入蜀记》、范成大《骖鸾录》、《揽辔录》等12种；中外杂记之属，有方凤《夷俗考》、孙穆《鸡林类事》等4种，史部合计179种。子部：艺术类、总论之属，有黄伯思《东观馀论》、周密《云烟过眼录》、陈樵《负暄野录》等4种；杂学类、杂论之属，有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吴处厚《青箱杂记》等115种；杂考之属，有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沈括《梦溪笔谈》等31种；小说类、杂录之属，有江休复《江邻几杂志》、陈正敏《遁斋闲览》、张师正《倦游杂录》等156种^①；谐谑之属，有王君玉《杂纂续》、沈俶《谐史》等15种；佛教类、杂著之属，有释道融《丛林盛事》、晁迥《法藏碎金录》、释晓莹《罗湖野录》等9种，子部合计330种。^② 史部与子部合计，共509种。当然，由于刘、沈二先生的搜集或有遗漏，因此这一统计不一定代表宋人笔记留存的真实情况，只能说相对接近而已。

宋人笔记的范围认定了，数量也大致清楚了，下面笔者主要根据它们的内容，对宋人笔记作如下分类，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简要的归类说明。

百科全书类：大到典章制度，小到鸡毛蒜皮，内容丰富庞杂。如：沈括《梦溪笔谈》、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是沈括晚年寓居润州梦

^① 笔者对子部的统计，在杂学类杂论之属、杂考之属两部分与张高评先生意见相同，具体数字亦同；而对于小说类杂录之属的统计，有与张先生意见相左之处。这一类中，有些不能算作笔记著作，如：李昉等辑《太平广记》五百卷系类书；张君房《丽情集》是传奇体小说集，据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的考证，该集多改编唐人传奇小说，内容以敷演艳情故事为主。（参见李著第二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85页）这类著作不当算作笔记。

^② 本统计依据刘琳、沈治宏编《现存宋人著述总录》一书，对史部金石类，子部工艺类、艺术类书画、音乐之属等，集部诗文评类等专门类，未作统计，巴蜀书社1995年版。